

斯大林
列宁主义問題

第九分冊

人民出版社

关于农村工作

(1933年1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各位发言同志已经把党的农村工作状况，工作的缺点和优点，特别是工作的缺点正确地描述出来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农村工作缺点方面的最主要的东西说出来，还没有把这些缺点的根子挖出来。而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请允许我对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发表意见，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毫不掩饰的精神来发表意见。

在去年，在1932年，我们农村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

主要缺点是我们去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前年，比1931年更大的困难。

决不能说这是由于收成不好，因为我们去年的收成不仅不比前年坏，而且比前年好。谁也不能否认，1932年粮食总收获量比1931年多，1931年苏联东北五个主要地区的旱灾使国家的粮食数量大大减少了。当然，我们1932年的收成也因为库班和捷列克以及乌克兰某些地

区的气候条件不利而受到了某些损失。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损失比起 1931 年由于东北地区发生旱灾而造成的损失来还不到一半。所以，我国 1932 年的粮食比 1931 年多。尽管如此，我们 1932 年的粮食收购工作还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难。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缺点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

(1)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没有能够估计到农村中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正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这种新环境，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改用新的工作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在还没有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的时候，在还没有两种粮价即国家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时候，农村中的环境是一回事。自从宣布了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农村中的环境就不免急剧改变了，因为宣布建立集体农庄商业就是使高于国家价格的市场粮食价格合法化。用不着证明，这种情况不免使农民在把粮食交给国家的时候产生一种吝啬的心理。农民这样盘算：“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已经宣布实行了，市场价格已经合法化了，我把同样数量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就应当把粮食留下来，少交一点给国家，多留一点给集体农庄商业，以便卖出同样数量的粮食

可以賺得更多的錢。”

这本来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然而糟糕的是，我們的农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不懂得这个簡單而自然的道理。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不致破坏苏維埃政权的任务，共产党员本来應該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即早在1932年7月，就竭力加强和督促粮食收购工作。这是环境所要求的。可是实际上他們是怎样做的呢？他們不去督促粮食收购工作，反而督促集体农庄建立各种儲备，这样就使粮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对国家的义务时更加吝嗇起来。他們既然不了解新环境，他們就不耽心农民在交納粮食方面的吝嗇心理会阻碍粮食收购工作，而耽心农民会想不到留下一些粮食以便后来运到集体农庄商业系統的市場上去，耽心农民也許会把自己的全部粮食交給国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农村共产党员，至少是其中大多数人，只了解集体农庄商业的**积极**的一面，只懂得和領会集体农庄商业的**积极**的一面，但是完全不懂得和沒有領会集体农庄商业的**消极**的一面，——他們不懂得，如果他們这些共产党员不是从收割庄稼的最初几天起就竭力督促粮食收购运动，那末集体农庄商业的消极的一面会使国家大受其害。

不仅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員犯了这种錯誤，而且国营农场的场长也犯了这种錯誤，他們罪恶地把應該交給国

家的粮食留下来按較高的价格卖给旁人。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其关于发展集体农庄商业的著名决议¹²⁵中是否估计到了由于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这种新环境呢？是的，是估计到了的。在这个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全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和收集种子以后，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在这个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结束粮食收购工作和种子储藏工作以后，大约到1933年1月15日的时候，——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好像是用他们的这个决议来警告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关心各种储备和储存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不要离开主要任务，要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展粮食收购工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工作，因为第一个任务是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第二个任务是储藏种子，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开始实行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

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错误也许在于他们没有十分坚决地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大声疾呼地预告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商业所包含的危险。但是，他们预告过这种危险，而且预告得十分清楚，这是毫无疑问的。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对区级工作人员，而且对某些省级

工作人員的列寧主義鍛煉和遠見是估計得高了一點。

也許本來就不應該宣布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商業不僅有積極的方面，而且還有某些消極的方面，所以宣布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也許是一個錯誤吧？

不，這不是一個錯誤。任何一個革命措施，如果執行得不正確，就不能保證沒有某些消極的方面。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商業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需要的和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實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宣布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時所考慮的是什麼呢？

首先，他們所考慮的是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的基礎，改進供應工人以農產品和供應農民以工業品的工作。毫無疑問，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營商業是不夠的。這些商品流轉的孔道必須用新的孔道即集體農莊商業來補充。我們建立集體農莊商業，也就是補充了這些孔道。

其次，他們所考慮的是通過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使莊員得到一種額外收入的來源，鞏固他們的經濟地位。

最後，他們所考慮的是通過集體農莊商業的建立來進一步推動農民去改進集體農莊在播種和收割方面的

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所考虑的这一切都被近来集体农庄生活中的事实完全証实了。集体农庄巩固的过程正在加强，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已經停止，个体农民更加想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員力求在接受新庄員时进行更严格的选择，——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类似的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証明集体农庄商业不仅沒有削弱集体农庄的地位，反而使它加强和巩固了。

由此可见，我們的农村工作所以有缺点，并不是因为建立了集体农庄商业，而是因为集体农庄商业有时經營得不正确，因为沒有能够估計到新环境，沒有能够改編自己的队伍来适应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

(2) 我們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不仅是这些同志)不了解我們的农村工作条件由于集体农庄在主要产粮区确立了統治地位而发生的变化。集体农庄經濟形式在我国产粮区已經成为統治的形式，这一点我們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个情况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們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責任，这一点却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許多人认为既然集体化在某个地区，在某个区域已經达到70%或80%，那就是說一切都已經办好，我們可以把事情交給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以为集体化自己会解决一切，自己会

提高农业。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过渡到集体经济这一占优势的經濟形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农业的关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提高农业方面的领导作用。现在放任自流对农业发展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现在放任自流会葬送一切。

当个体农民还在农村中占优势的时候，党对农业发展事业的干预可以只限于个别的帮助、劝告或警告。当时个体农民必须亲自照料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经济只是他个人的经济，他不能把经营这个经济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当时个体农民如果不愿意挨饿，不愿意饿死，就得亲自照料播种和收割，照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一旦转入集体经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集体农庄不是个体经济。集体农庄庄员现在这样说：“集体农庄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体农庄是我的，但同时又是伊万、菲力普、米哈伊尔和其他庄员的，集体农庄是大家的。”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集体农庄庄员现在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庄员身上，可以指望其他庄员，因为他知道集体农庄是不会使他挨饿的。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经营经济的责任的重心已经由个别农民身上移到集

体农庄的领导机关，集体农庄的领导核心身上了。现在农民并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体农庄领导机关，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要求自己，不如说是要求集体农庄领导机关来关怀经济和进行合理的经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党现在已经不能只限于对农业发展过程进行个别的干预了。它现在应当亲自担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亲自担负起工作的责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经济。

但是还不止此。集体农庄是大经济，而大经济没有计划是不能经营的。包括几百农户，有时甚至包括几千农户的大农庄，只有通过计划指导才能经营。否则它就会垮台，就会瓦解。你们看，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下的另一个新条件，这个条件和经营个体小经济的条件是根本不同的。能不能把经营这种经济的事情交给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呢？当然不能。要经营这种经济，就必须保证集体农庄有必要数量的具有基本知识、能够计划经济并且善于有组织地经营经济的人材。很明显，没有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经常干预，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经常帮助，要办好这种经济是不可能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集体农庄制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责任。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党如果愿意领导集体农庄运动，就应当熟悉集体农庄生活和集体

农庄领导中的一切詳情細節。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党不应当减少，而应当增加它和集体农庄的联系，它应当知道集体农庄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便及时帮助集体农庄，并預防那些威胁集体农庄的危險。

实际上我們看見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們看見的是許多区組織和省組織同集体农庄生活脫节，同集体农庄的需求脫节。人們在办公室里坐着，洋洋得意地耍笔杆，却不知道集体农庄是在官僚主义的办公室外面发展着的。同集体农庄生活的脫节有时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某些边区組織的委員不是从有关的区組織那里，而是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員那里知道本边区集体农庄的情况的。同志們，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由个体經濟过渡到集体农庄本来應該使共产党員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加强起来。但是实际上这一过渡往往使共产党員以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自夸而高枕无忧，把事情交給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对集体农庄經濟实行計劃指导的問題本来應該使共产党員在集体农庄里的领导作用加强起来。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員往往袖手旁观，而让从前的白卫軍官，从前的佩特留拉分子和工农的一般敌人去把持集体农庄。

我們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此。

(3) 我們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我們許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經濟形式估計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們断定：既然有了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經濟形式，那就是說一切都已經办好，集体农庄的正确經營、集体农庄經濟的正确計劃、集体农庄的成为模范社会主义农庄都已經有了保障。他們不了解集体农庄就組織結構來說还很幼弱，無論在供給集体农庄經過考驗的布尔什維克干部方面，或是在集体农庄事务的日常領導方面，都还需要党的大力帮助。但是这还不能概括一切，甚至还不是主要之点。这里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們許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农业組織形式本身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計过高。他們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經濟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領導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維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苏維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样。無論集体农庄或苏維埃都是我們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工人階級的最伟大的成果。但集体农庄和苏維埃不过是一种**組織形式**，不錯，它是社会主义的**組織形式**，但它終究是一种**組織形式**。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內容**为轉移。

我們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实：工兵代表苏維埃曾經在一定时期內帮助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在我們苏联，例如

在1917年7月就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苏維埃是由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所以当时苏維埃掩护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德国在1918年末也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苏維埃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所以当时苏維埃掩护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可见問題不仅在于苏維埃这种組織形式，虽然这种形式是极大的革命成果。問題首先在于苏維埃的工作內容，問題在于苏維埃的工作性质，問題在于苏維埃究竟是由誰领导的，——是由革命者领导的还是由反革命分子领导的。正因为如此，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表示反对苏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动¹²⁶时期，俄国反革命头子米留可夫就曾經表示拥护苏維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員参加。“拥护不要共产党員参加的苏維埃”，这就是俄国反革命头子米留可夫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反革命分子懂得：問題不仅在于苏維埃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苏維埃由誰领导。

关于集体农庄也必須这样說。如果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經濟組織形式是由真正的革命者，由布尔什維克，由共产党員领导的，那末它就能显示出經濟建設的奇迹。相反地，如果集体农庄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佩特留拉的軍官和其他白卫分子、从前的邓尼金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所把持，那末它在一定时期內就能变成各种反革命活动的掩蔽所。同时还要注意到，集体农庄这一組織形式不仅不能防止反苏維埃分子钻进来，而且在

初期甚至会給反革命分子某些方便来暫時利用集体农庄。当农民还在經營个体經濟的时候，他們是分散而彼此隔絕的，因此，反苏維埃分子在农民中間的反革命阴谋还不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而在农民过渡到集体农庄經濟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农民已經有了現成的群众組織形式，即集体农庄。因此，反苏維埃分子钻进集体农庄和进行反苏維埃活动也就能够产生大得多的效果。想必反苏維埃分子是估計到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自己竭力設法建立一种类似集体农庄的組織，利用这些組織作为他們的秘密組織的合法掩蔽所。大家也知道，反苏維埃分子在他們还没有被揭穿，还没有被击潰的那些地区，总是乐意加入集体农庄，甚至贊美集体农庄，以便在集体农庄內部建立反革命工作的巢穴。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一部分反苏維埃分子自己表示拥护集体农庄，但是以不要共产党员参加集体农庄为条件。“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集体农庄”，这就是反苏維埃分子现在所拟定的口号。可見問題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組織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問題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誰主持，集体农庄由誰領導。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組織形式，也和苏維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

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根据他们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了解到这一点了。

可惜我们有些共产党员还不了解这一点。

正因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现在伪装得很巧妙的反苏维埃分子就在某些集体农庄里把持一切，在那里组织暗害和怠工。

(4) 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产生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于改变反富农斗争的战线，不了解阶级敌人的面目近来已经改变，不了解农村中阶级敌人的策略已经改变，不了解因此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策略以取得胜利。敌人已经了解这种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了解农村新制度的力量和威势，因此，他们就改编了自己的队伍，改变了自己的策略，由对集体农庄的正面进攻转为暗中破坏。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没有看清新环境，继续在已经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找敌人，继续采取和富农进行简单斗争的旧策略，其实这个策略早已过时了。

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人们寻找我们在宣传画上所看见的那种富农。可是地面上早已没有这种富农

了。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維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藹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們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員、秘书等职务。他們任何时候也不会說“打倒集体农庄”。他們“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們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他們任何时候也不会說“打倒粮食收购工作”。他們“拥护”粮食收购工作。他們“只是”进行煽动，要求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建立超过实际需要两倍的后备，要求集体农庄設置超过实际需要两倍的保险基金，要求集体农庄按每个工作人員每天六磅至十磅的标准发粮食給公共食堂等等。显然，在建立这种“儲备”和发給公共食堂这些粮食以后，在經過这一番狡詐的煽动以后，集体农庄的經濟力量必定受到損害，而粮食收购工作也就沒有进行的余地了。

要識破这种狡猾的敌人而不受他們的煽动，就必须具有革命警惕性，就必须具有摘下敌人的假面具而向集体农庄庄員指明敌人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本領。可是，我們农村中具有这种品质的共产党员多不多呢？共产党员往往不仅沒有揭穿这种阶级敌人，反而自己受了他們的狡詐的煽动，做了他們的尾巴。

我們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见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阶级敌

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們的欺騙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維埃分子已經由于消灭富农階級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因此可以让“中立的”集体农庄存在，这种“中立的”集体农庄既不是布尔什維克的，也不是反苏維埃的，但是它們一定会按所謂自发方式轉到苏維埃政权方面来。同志們，这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富农被击潰了，可是还远沒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員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謂自发的發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去，那末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至于“中立的”集体农庄，那末天地間根本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集体农庄。“中立的”集体农庄是长着眼睛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的幻想。在我們苏維埃国家目前所发生的这种尖銳的階級斗争环境中，“中立的”集体农庄决沒有存在的余地；在这种环境中，集体农庄**或者是**布尔什維克的，**或者是**反苏維埃的。如果某些集体农庄不是由我們領導的，那就是說，它們是由反苏維埃分子領導的。这一点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5) 最后，我們的农村工作产生缺点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共产党員在集体农庄建設事业中的作用和責任，对共产党員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估計不足。在談到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时，共产党員通常都把責任推到农民身上，硬說一切都是农民的过失。这是完全不对的，是絕對不公平的。这和农民毫不相干。如

果說到責任和過失，那末責任完全要由共產黨員來負，全部過失都是我們共產黨員的過失。

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像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強大而有威信的政權。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像我們共產黨這樣強大而有威信的政黨。誰也沒有阻礙而且不能阻礙我們按照集體農莊利益的要求、按照國家利益的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不是時時刻刻都按照列寧主義的要求來從事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往往犯許多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例如在糧食收購方面的錯誤，那末這是我們的過失，而且僅僅是我們的過失。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沒有看清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的消極方面，犯了許多極嚴重的錯誤。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許多黨組織和集體農莊脫節，高枕而臥，屈服於自發勢力。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許多同志仍然對集體農莊這一群眾組織形式估計過高，不懂得問題與其說在於形式本身，不如說在於親自負起集體農莊的領導責任，並把反蘇維埃分子從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沒有看清新環境，沒有了解進行暗中破壞的階級敵人的新策略。

試問，這和農民有何相干？

我知道有許許多多的集體農莊都在不斷發展，日益繁榮，切實執行國家的任務，在經濟上一天比一天鞏固。